

# 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sup>[1]</sup>

文/朱玉麒

甲午新正，笔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经友人介绍，汉和堂主人陆宗润先生见招，因前往拜访。陆先生于1980年代后期到日本交流，其时他在中国从事书画修复与装裱工艺多年，颇有建树。但是看到日本装裱技艺的独特风格，便重又开始了在东瀛的学徒生涯。十年辛苦，遂融汇汉和，在书画装裱业界自创一家，成为传统书画修复业的翘楚。

在大阪四天王寺附近的汉和堂工作坊，我们虽然初识，而以文会友，得以饱览热情的主人出示的书画收藏。这些珍贵的收藏品是主人揣摩古代装帧、修复技术，品鉴中国书画精神的样本，可见在融汇中、日修复技艺之外，汉和堂直追书画之心、“功夫在诗外”的高远境界。主人又了解到笔者从事西域文史的研究，遂出具了褚德彝题跋本《刘平国碑》、李晋年题跋本《裴岑碑》等西域石刻拓本，以及大谷探险队带来的敦煌三藏法师绢画等来自西北的书画以供赏玩，足见其收藏之自成系统、眼光独具。

慷慨的主人不仅没有将这些收藏秘不示人，而且鼓励有兴趣的同道参与研究。在告辞汉和堂不久，我即收到其赐赠《裴岑碑》拓片的专业图版（图1），并授权研究。下文即遵汉和堂主人乐于流布的意愿，对此珍贵的藏品略作探研。

## 《裴岑碑》的发现与拓本流传

《裴岑碑》是在新疆天山东部、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发现的东汉永和二年（137）边塞战争纪功碑。在东部天山的南北麓，还发现过永元三年（91）的《任尚碑》、永和五年（140）的《沙南侯碑》，都是东汉王朝在西部地区与匈奴发生战争而得胜铭功的纪念物。<sup>[2]</sup>

《裴岑碑》的价值，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裴岑碑》与其前后的纪功碑的出现，距离目前所知最早的边塞战争纪功碑——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战胜北匈奴、“勒铭燕然”的刻石时年很近，它们是以《燕然山铭》为范式的边塞纪功碑最早的一批继承者，对纪功碑这一汉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裴岑碑》印证了传世典籍中关于敦煌太守在东部天山总领抗衡匈奴指挥权的事实存在，填补了诸多不为史籍记载的历史细节。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裴岑碑》是现在发现唯一可以完全识读、字迹清晰的西域汉碑。其文字书写表现出由篆而隶转化的书法趣味，与中原内地发现的汉代碑刻共同印证了文字、书法源

流的历史演变。而《裴岑碑》在清代初期被发现之后，正遇上清代书法史上碑学的盛行和考据学中对石刻史料运用的蔚成风气，一时书家与朴学之士，趋之若鹜，题跋、吟咏、临写不绝，从纪晓岚、毕沅、钱大昕、牛运震、翁方纲、黄易、王昶、赵绍祖、申兆定、洪颐宣、张澍、洪亮吉、梁章钜、徐松、龚自珍、许瀚、张廷济、何绍基到康有为、梁启超、王树楠、罗振玉、王国维，网罗了乾嘉以来直到晚清、民国时期朴学和碑学的诸多重要人物（图2）。

有关《裴岑碑》在清代的发现和流传情况，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记载最详：

雍正七年（1729），岳威信公于石人子获汉碑，度之幕府。十三年撤兵，移置镇西府城北二百餘步关壮缪祠西阶下。余度以虚僦尺，碑高四尺三寸，宽一尺八寸，六行，行十字，隶书。<sup>[3]</sup>

岳威信公指岳钟琪（1686-1754），卒谥威信，故称。岳钟琪于雍正间拜宁远大将军，往西域平定准噶尔叛乱，因得此碑石，并在撤军时将其安置在巴里坤城北的关帝庙前，后人又为之筑镇海亭保护，故该碑又有《镇海碑》之名。徐松嘉庆十七年遣戍伊犁，二十五年赐环归京，均曾亲历其地，从原石打拓，并过录了碑文。<sup>[4]</sup>在其道光年间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中，不仅

详细记载了该碑的形制，同时对前人始终不能明白的“海祠”一词，进行了恰当的解释。兹录其对《裴岑碑》释读的文字如下，以便分析：

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疾，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sup>[5]</sup>

不过，徐松所载的雍正七年还不是《裴岑碑》最早被发现的时间。据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滨州人张寅（1670-？）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为平定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叛乱而奔赴哈密前线时，在其日记《西征纪略》中，已经记载了巴里坤的汉《裴岑碑》和唐《姜行本碑》。<sup>[6]</sup> 而王昶的《金石萃编》“姜行本碑”条下引嘉兴许灿《晦堂诗钞》之《汉唐纪功碑诗》，亦云“诗作于康熙间”，它所记载的汉唐碑，也是指上揭《裴岑碑》和《姜行本碑》。<sup>[7]</sup> 所以我们知道，在康雍乾三朝平定西北准噶尔叛乱的战事中，《裴岑碑》从一开始的康熙年间就受到了关注。

碑刻拓片在内地的广泛流传，是从乾隆时期开始的。据何绍基（1799-1873）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考》的记载：“雍正七年，岳大将军始得之于石人子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裴文达公始打本流传。”<sup>[8]</sup> 裴文达公指裴曰修（1712-1773），乾隆二十二年曾在巴里坤董理军储，卒谥文达，故称。道光年间任哈密办事大臣的萨迎阿（1779-1857）《东行短述》诗就有“汉碣唐碑拓百纸”的记载，<sup>[9]</sup> 可见



图1: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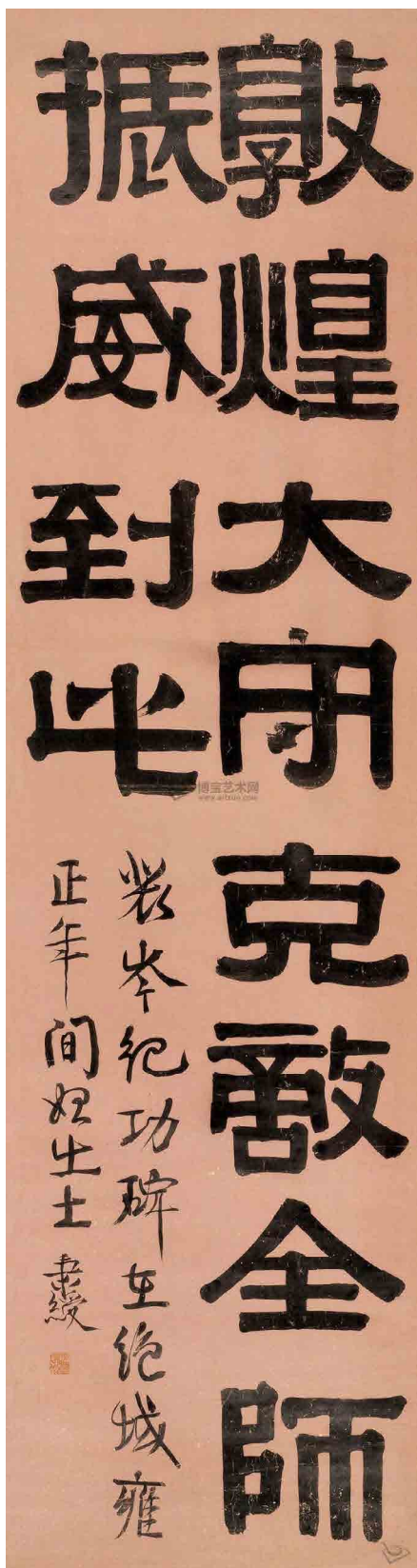


图2-1：伊秉绶（1754-1815）临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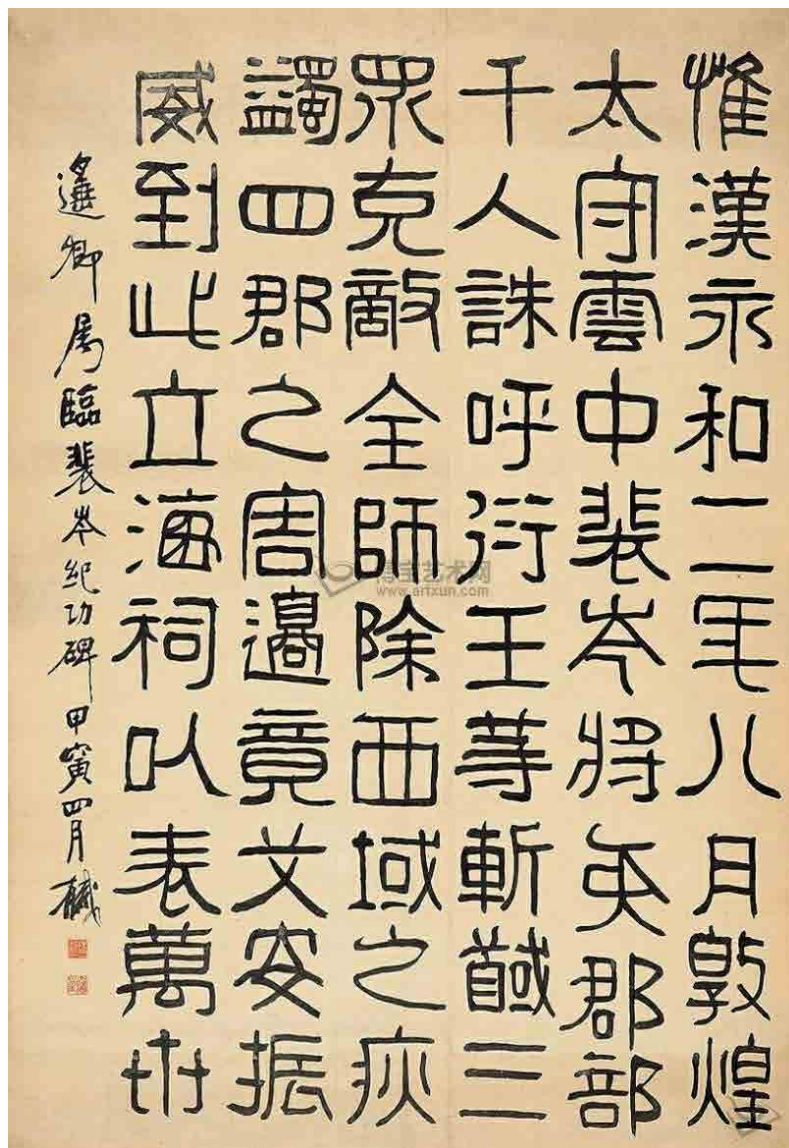


图2-2：魏觥（1870-1938）临本

其分送内地文友的需求之多。该碑在乾隆时期纂修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已有考证，但辨识不精，录文有误。<sup>[10]</sup> 同期曾经流放乌鲁木齐的大学士纪昀（1724-1805）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两次记录了有关《裴岑碑》的故事。<sup>[11]</sup> 此后的记载与题跋更是不绝如缕。

即使远在塞外，《裴岑碑》在崇尚

汉碑的时代也难逃推拓毁坏的厄运。咸丰二年（1852）遣戍西域的冯炳堃（1786-1858），就记载当地官员之间流传的《裴岑碑》拓片，有模糊的石刻原拓本和清晰的木刻拓本两种，原刻拓本的情形是：“字字皆模糊，可认者稀。……因年久模糊，该处役匠将钉头按字凿挖，以致笔画加粗，全失原碑面目，数千年旧物，毁诸拙工之手。惜

哉！”<sup>[12]</sup>这种情形也是缘自原石被捶拓的频繁，所以当地军士便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原石的字迹进行凿挖，使其清晰；二是制作木刻拓本，代替原拓。据纪昀的记载，乾隆年间，当地的军士就已经制作这样的赝品了：

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关帝祠中，屯军耕垦，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见《后汉书》，然文句古奥，字划浑朴，断非后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无人摹拓，石刻锋棱犹完整。乾隆庚寅（三十五年，1770），游击刘存存（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武进人也）摹刻一木本，洒火药于上，烧为斑驳，绝似古碑。二本并传于世，赏鉴家率以旧石本为新，新木本为旧。与之辩，傲然弗信也。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尚如此，况于千百年外哉！<sup>[13]</sup>

所以内地的学者感叹即使来自巴里坤的拓本，也不可轻信其为真本，黄易（1744-1802）有“苦寒之地，摹搨殊艰，土人遂有模刻者”的题跋。<sup>[14]</sup>彭蕴章（1792-1862）《汉裴岑纪功碑跋》则说得更为形象：“裴岑纪功碑在巴里坤，末云‘立德祠以表万世’，一本作‘海祠’。……后知天山常为积雪所封，人迹不到，山下有翻本，过客所得，皆非真本也。”<sup>[15]</sup>彭氏的记录虽与巴里坤《裴岑碑》度藏地的实际情况未必相符，但是通过仿刻本应付求索的事理还是明确的。

由于石刻远在关外，拓片供不应求，以至在内地的仿刻、伪本也纷纷而出。仿刻本知名者有西安府学（今碑林）和济宁学宫两处，供人捶拓，是道光中期为时人所共知的情况，如龚自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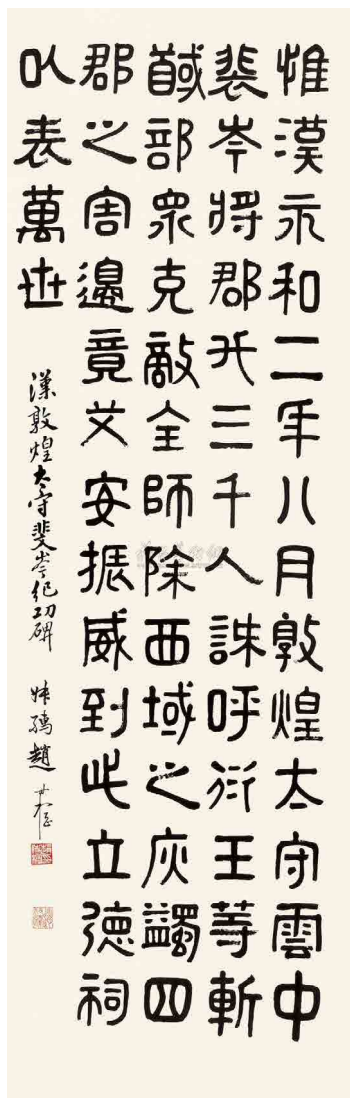


图2-3：赵叔孺（1874-1945）临本

（1792-1841）在《跋宋拓本裴岑纪功碑》感叹说：“此碣近已不可辨，重摹本有二，字画皆可丑。远在万里，椎拓为艰；但是原石，即可珍重，况旧拓乎？此乃百金之宝。”<sup>[16]</sup>吕世宜（1784-1855）《裴岑纪功碑跋》则将原刻、巴里坤当地的摹刻以及此二刻本并称《裴岑碑》四本：“右碑原在巴里坤，即今西塞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将军岳钟琪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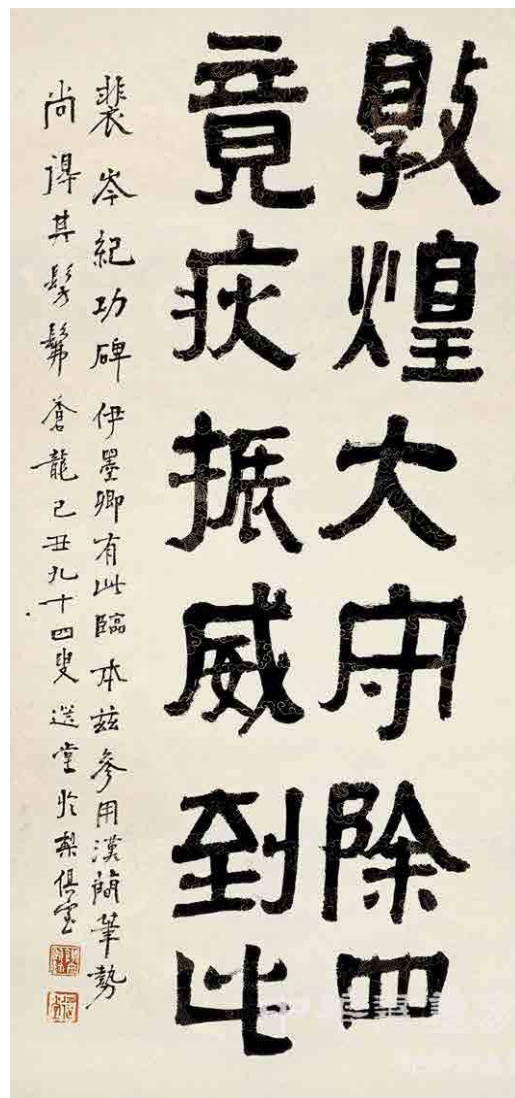


图2-4：饶宗颐（1917-）临本

置将军府。十三年彻师，又移置汉寿亭侯庙。碑中字无波势，与孝王刻石同。乃由篆入隶之渐，甚古雅。土人有重摹本。其真本多为拓手描失，然必有描失处乃为原刻。此外，长洲顾芦汀文铎又刻于济宁，讹‘德祠’为‘海祠’。申兆定又刻于关中。则合原刻共有四本。”<sup>[17]</sup>其他如所谓“周德华摹刻徐星伯旧藏本”、“蔡廷宾木刻本”也都是当时珍本难求而坊间流传的替代品（图3）。



鉴于珍本的难求，为了防止误收这种来自碑石原藏地和内地各处的仿刻本，真正的收藏和鉴赏家也动用了官方的渠道来完成这种远程的需求——铃盖地方官印的方式被用于西域石刻的拓本。就《裴岑碑》而言，铃盖“管辖巴里坤满州兵丁领队大臣之印”、“镇守巴里坤等处总兵官之印”、“甘肃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等官印的拓本，就属于清代后期由官方认定的拓自原石的真本（图4）。“管辖巴里坤满洲兵丁领队大臣之印”系驻扎巴里坤的满营军官印，“镇守巴里坤等处总兵官之印”系驻扎巴里坤的绿营军官印。清代平定西域之后，东部地方

设满营领队大臣五，归乌鲁木齐都统总理，巴里坤领队大臣即其一；设绿营总兵三处，即巴里坤镇、阿克苏镇、伊犁镇。巴里坤领队大臣的驻防在新疆建省的光绪十年（1884）即告解散，而巴里坤镇总兵的设置则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sup>[18]</sup>“甘肃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则是巴里坤民政官员的印章。清代巴里坤地方的行政建置，在乾隆二十一年，设立了巴里坤理事同知；二十五年，改设巴里坤直隶厅；三十八年，设立镇西府；咸丰三年，改建镇西直隶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镇西厅归新疆省镇迪道管辖，但其关防用印仍延续“甘肃镇西抚民直隶

厅”字样，直到民国二年（1913），始改厅为县。1954年，又更今名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sup>[19]</sup>

汉和堂藏本的石刻拓片上方，确实铃盖有“甘肃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满汉合璧朱文长方印，可以证明其系来自巴里坤原石的拓本无疑。更为重要的，从以下我们将要分析的题跋来看，这一拓片是巴里坤镇西厅同知李晋年上呈其上司兼文友王学曾的墨宝；对于一个能够亲眼目验原石并有权力获得拓片的地方官员来说，文人间的交往也绝无弄虚作假的必要。核检此拓片与乾隆年间黄易等人所得真本比较，确实是捶拓完美的一件晚清杰作。



图3-1：西安碑林申兆定仿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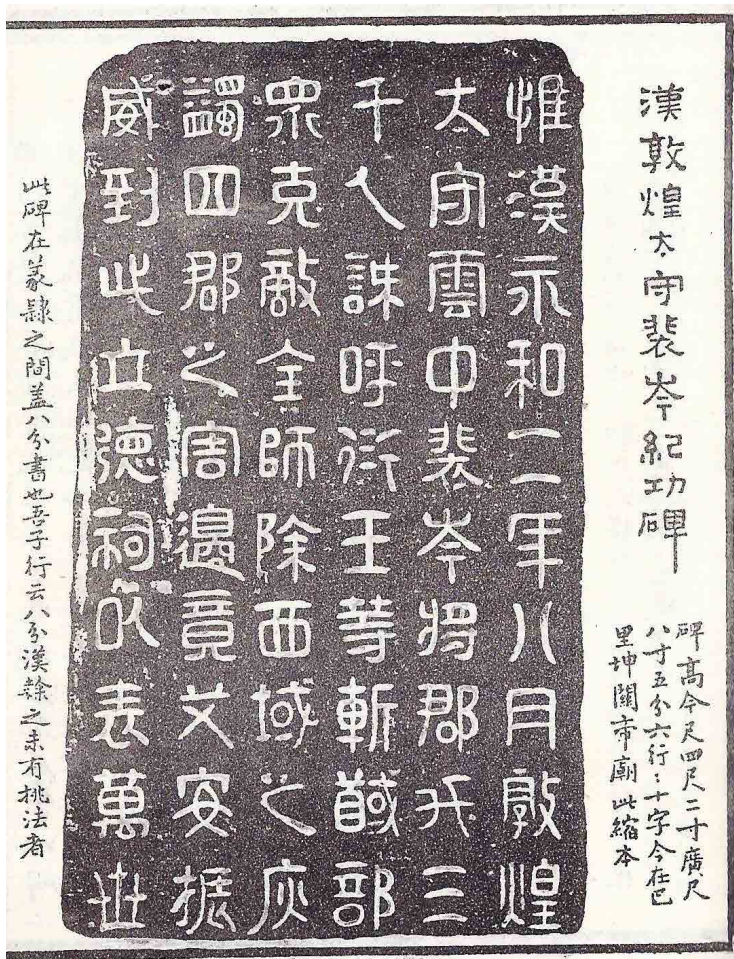


图3-2：道光元年冯云鹏、冯云鹗辑刊《金石索》之缩刻本





图4-1：甘肃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



图4-2：管辖巴里坤满州兵丁领队大臣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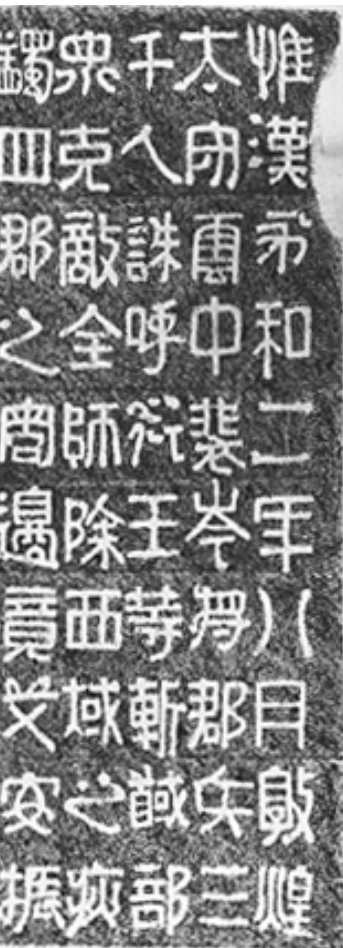


图3-3：京都大学人文研藏仿刻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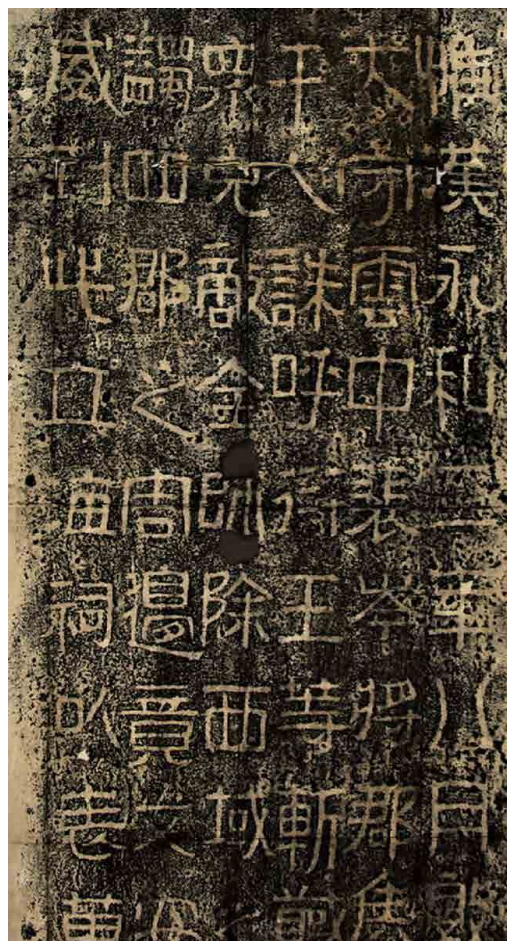


图3-4：坊间流传仿刻拓片



图4-3：镇守巴里坤等处总兵官之印





图 5: 《裴岑碑》石刻现状



《裴岑碑》原石今藏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sup>[20]</sup>笔者2012年曾得拜观。经过三百多年的捶拓以及搬运颠簸，原石已经碎裂，主体所存字迹仅遗上半部分，而末一行也尽脱落（图5）。由此而言，以汉和堂为代表的清末拓本，可能是最后一批硕果仅存的原石完整拓本。

### 汉和堂藏拓上的李晋年题跋

汉和堂藏拓不仅如上所说，是三百年来鱼目混珠的《裴岑碑》拓片流传中难得的真本，更重要的，它的题跋也为我们提供了晚清新疆文坛重要的文化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珍品。

笔者曾经调查日本公私收藏、已经公布的《裴岑碑》拓本，藤原楚水

《译论语石》、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金石拓本研究会《汉碑集成》均影印有《裴岑碑》的石刻拓片，<sup>[21]</sup>前二种碑首均隐约可见“甘肃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印，最后一种则有道光年间的收藏家刘位坦（1802-1861，字宽夫）的名字印“刘位坦”、“宽夫”；考察三种拓片的字迹，应该也是流传有自的清代原石拓本。但是与汉和堂本比较，后者的题跋就不是其他三种所能企及的了。《汉代石刻集成》的拓片注明是来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收藏品，而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料·文字拓本”网络上，还可以看到其收藏的另一幅拓本，则是仿刻无疑（见上图3-3）<sup>[22]</sup>。

兹先录汉和堂本题跋如下，再作考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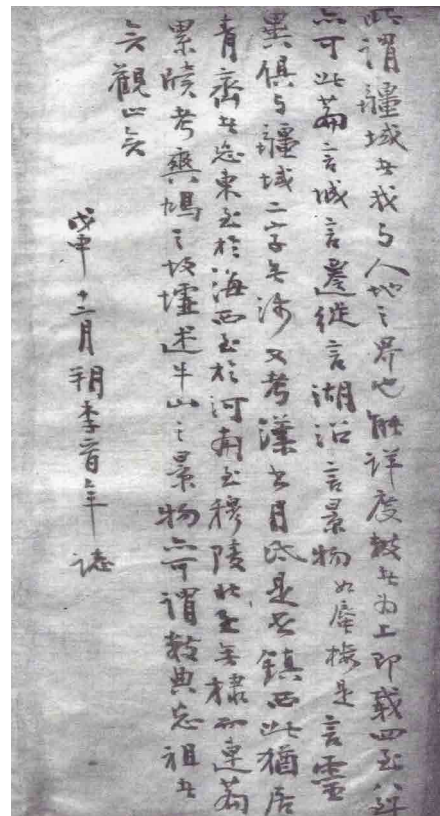


图7：首都图书馆藏《镇西厅乡土志》李晋年题跋



图6：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李晋年题跋局部



永和二年为东汉顺帝十有二年，裴岑事迹不著。以前后事迹考之，东汉西域自建武至延光，三绝三通。蒲类界匈奴西部，常为战地，张瑄疏云“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者也。裴岑之出战，又在三通之后，自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破匈奴于天山，追至蒲类海，班超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此六十三年以前事也。顺帝永建元年，班勇击破呼衍王，此十二年前事也。顺帝阳嘉四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救之，不利，车师后部遂为所破，此二年前事也。当时，车师后部有前后卑陆、单桓等八国，以今地证之，乌鲁木齐西至玛纳斯、东至济木萨城。匈奴既破车师后部，势必南攻鄯善，塞汉出关之路，以次内侵，则河西四郡危矣。裴岑之出，殆为车师后部也。其路由敦煌，出玉关，度白龙堆，至伊吾，过天山北，至蒲类海。其战地约仍在蒲类海

以与匈奴右部相接也。裴岑以三千人诛名王，其车师后部自仍与汉通。碑文谓“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者，非夸词也。厥后又九年，伊吾司马遣吏至蒲类，与呼衍王战，尽为所没。敦煌太守马达出塞至蒲类，呼衍王引去，殆犹怵此战之余威歟？史传见遗，殊不可解。

《西域水道记》：“雍正七年，岳威信公防准，获碑于石人子。十三年撤兵，移置镇西北二百余步之关帝庙。”今在庙西阶下，有亭覆之。宣统三年六月，拓奉少鲁观察正。子昭李晋年志于坤城。（图6）

题跋的内容围绕裴岑诛杀匈奴呼衍王的战争，根据正史资料的记载，探讨了这一未被史传记载的纪功碑填补西域史的重要性。作为传统科举教育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李晋年熟读经史的知识储备使他能够非常娴熟地使用《后汉书·西域传》、《班超传》等相关资料，而

排列出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汉匈西域战争的前后序列。即裴岑战事之前六十三年前的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前十二年的顺帝永建元年（126）班勇击破呼衍王，前二年的顺帝阳嘉四年（135）呼衍王破车师后部，以及之后十四年（题跋作九年，误）的桓帝元嘉元年（151）敦煌太守马达领兵出塞、呼衍王引去。这些史实的钩稽在清代学者的题跋中都能够看到，但是李晋年从敦煌太守裴岑大获全胜、此后敦煌太守出兵而呼衍王引去的联系中，印证了敦煌太守在东部天山经营中的最高指挥权、突出了裴岑战事重树敦煌太守出兵军威的意义，还是具有独特见地的。

题跋的作者李晋年（1860—1929），字子昭，河北滦南人，隶汉军正白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伊犁将军长庚以候补同知聘以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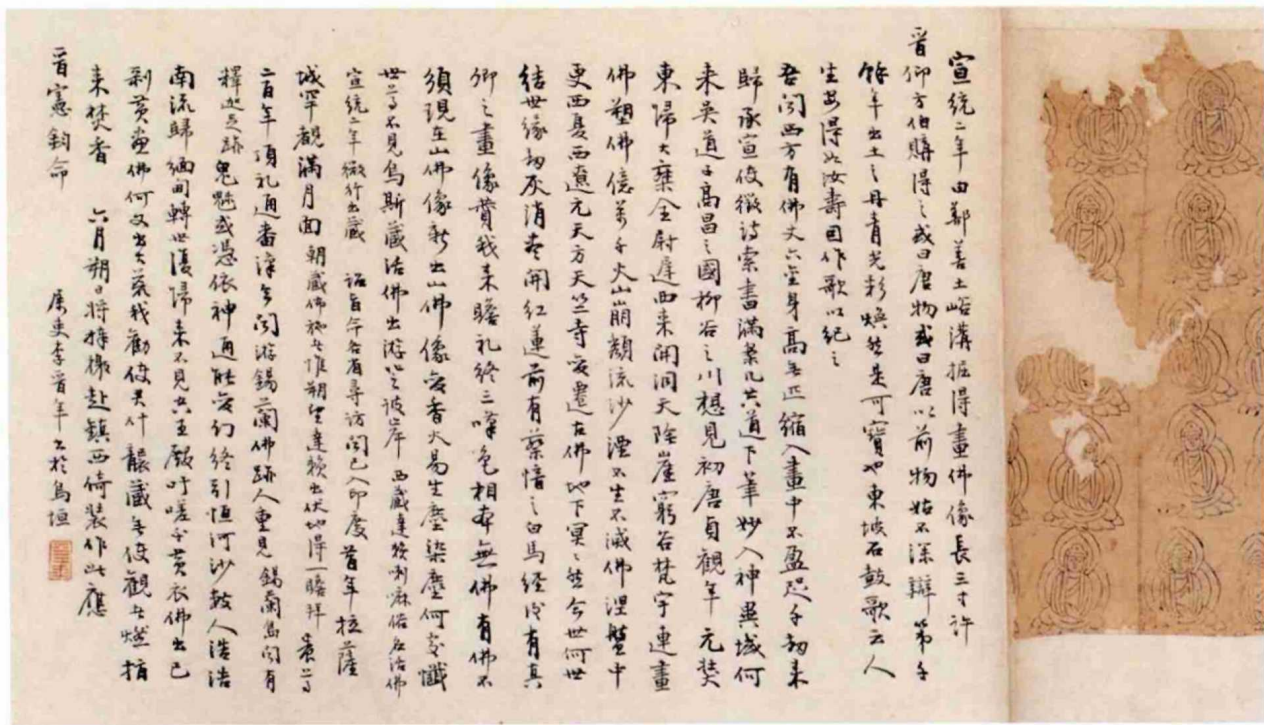


图8：书道博物馆藏《北京写经残卷》李晋年题诗



新，参与《新疆图志》的编纂，后任镇西厅同知。民国以后，历任新疆镇西、巴楚、沙雅、墨玉等地方官，及省府高等顾问。著作有《新疆回教考》、《春秋今事比》、《唐代藩镇考》、《西域金石补证》、《沙雅县志》等行世。<sup>[23]</sup>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西域研究专家李征即其哲嗣。

李晋年题跋拓片的赠送对象“少鲁观察”，是王学曾（1870-?）。学曾字少鲁，山西文水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乡试解元，以新疆候补道充新疆通志局总纂，是《新疆图志》的总纂官。民国成立后，历任焉耆知府、喀什噶尔兵备道、新疆政务厅厅长等职，并充民国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著有《矩矩斋文集》。李晋年与王学曾的相识可能就是在乌鲁木齐共同参与编纂《新疆图志》时期。今《新疆图志》“纂校衔名”，“总纂”下有“奏派办理新疆通志候选道臣王学曾”，“协纂”有“新疆候补同知臣李晋年”。而《新疆图志》最早的版本——1911年新疆官书局发行的活字本封面，即由王学曾题签。可见王、李二人都有翰墨之好。《新疆图志》的《金石志》也收录了《裴岑碑》，因此当李晋年升任镇西厅同知而有获观《裴岑碑》原石并拓片的机会时，题跋赠送过去的文友，成为理所当然。

有关李晋年的生平，没有系统的资料记载。从零星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在镇西厅任上，他还是做了相当多的民政工作。如《新疆图志·学校志》记录了他在当地兴学的情况：“（镇西厅）官立第二简易识字学塾：在治城外西园子，宣统二年同知李晋年设立，堂舍用龙王庙；官立第三简易识字学塾：在城

图C：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碑》拓片李晋年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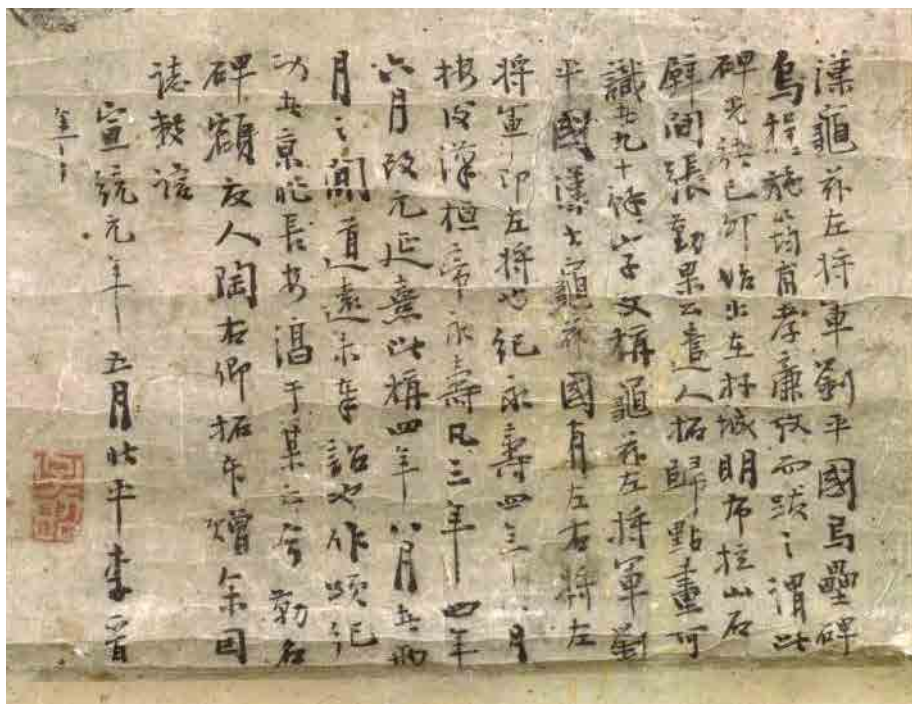


图9：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碑》拓片李晋年题跋

内东大街，宣统元年同知李晋年设立，堂舍借用民房。”<sup>[24]</sup>由魏长洪整理发表的前揭李晋年《坤哈变事记》，也记载了辛亥革命前后巴里坤民变，群推已经卸任的李晋年担任同知安抚大局的过程。可见其在地方建树上具有的威望。

最近影印出版的首都图书馆藏抄本《镇西厅乡土志》中，也有李晋年的题跋（图7）：

所谓疆域者，我与人、地之界也，能详度数者为上，即载四至八到亦可。此篇言城、言迁徙、言湖沼、言景物（如厦楼是）、言灵异，俱与疆域二字无涉。又考《汉书》月氏是世镇西。此犹居青齐者忘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而连篇累牍考爽鸠之坟墟，述牛山之景物，亦可谓数典忘祖者矣，观止矣！戊申十二月朔李晋年志。<sup>[25]</sup>

戊申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

李晋年在《新疆图志》编纂任上。从他对《镇西厅乡土志》的看法，可以了解其对地方志编纂注重实际、不为虚夸的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为人，与后来他在镇西任上的作为也是一致的。

李晋年擅诗文书画，履任新疆之后，与布政使王树楠（1851—1936，楠多作柎、柎，字晋卿）等文人在编纂《新疆图志》之际，相与唱和，形成了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在晚清最后的雅集风貌，体现了那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sup>[26]</sup>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的王树楠旧藏吐鲁番文书《北京写经残卷》上，即有李晋年的赋诗（图8）。兹录其前后序跋文字云：

宣统二年（1910），由鄯善土峪沟掘得画佛像，长三寸许。晋卿方伯购得之。或曰：唐以前物。姑不深辩，第千馀年出土之丹青，光彩焕然，是可宝也。东坡《石鼓歌》云：“人生安得如

汝寿。”因作歌以纪之。

……

六月朔日，将捧檄赴镇西，倚装作此，应晋宪钧命。属吏李晋年书于乌垣。（钤“晋年”朱长方）<sup>[27]</sup>

从这一长篇题诗可以看到李晋年的才情；从诗歌的前后文字，也使我们了解到他由“候补同知”被任命为“镇西抚民直隶厅同知”的实缺，其赴镇西任上的确切时间——宣统二年六月一日。

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李晋年题跋的《刘平国碑》拓本，其题跋云（图9）：

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乌垒碑，乌程施筠甫孝廉考而跋之谓此碑光绪己卯始出，在拜城明布拉山石壁间。张勤果公遣人拓归，点画可识者九十馀字。文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汉书》龟兹国有左右将，左将军即左将也。纪永寿四年八月，按后汉桓帝永寿凡三年，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称四年八月者，两月之间道远未奉诏也。作颂纪功者，京兆长安淳于某云。今勒名碑额。友人陶右卿拓本赠余，因志数语。宣统元年五月北平李晋年。

《刘平国碑》是施补华（1835—1890，字筠甫）在光绪五年（1879）在新疆拜城县发现的东汉永寿四年（158）龟兹国左将军所立摩崖石刻。<sup>[28]</sup>李晋年考证龟兹左将军在《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永寿四年六月改元延熹而石刻在八月仍称永寿的“道远未奉诏”，均见其对传世典籍的了然于胸，可以与其《裴岑碑》的拓片题跋互相呼应。

综上所述，汉和堂藏《裴岑碑》拓片是石刻发现以来仿刻、伪本间出的



三百年中难得的真本，拓片上的题跋反映了清代新疆文坛书画往来、碑刻鉴赏的风雅面貌，为考索李晋年等履新文士的生平和近代新疆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文献。汉和堂拓片的公布，让我们相信民间珍藏的陆续出现，是研究西域碑刻、接近新疆历史真相的重要渠道。（朱玉麒，曾任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域文史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

【1】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5）成果之一。

【2】相关研究，参笔者《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辑，125-148页。

【3】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82页。

【4】徐松《西域水道记》卷首英和题词下注云：“西域《汉裴岑碑》、《唐姜行本碑》率多贗本，星伯皆手拓之；又于燉煌县搜得唐索勋及李氏修功德两碑，皆向来著录家所无者。”《西域水道记（外二种）》，13页。又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十七年”条下载：“为御史赵慎珍所纠，谪戍伊犁。出嘉峪关，过镇西府，手拓《裴岑纪功碑》。”《艺风堂文集》卷一，《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37册，233页。

【5】同注3。

【6】张寅《西征纪略》，吴丰培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47-66页。

【7】王昶《金石萃编》卷四五，嘉庆十年（1805）经训堂版，叶一五背。

【8】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29册，205页。

【9】萨迎阿《心太平室诗钞》附《再出玉门草》，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诗句下有自注：“汉裴岑纪功碑在巴里坤，唐姜行本纪功碑在天山。”

【10】《西域图志校注》，钟兴麒等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82-183页。

【1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二册，181、233页。

【12】冯炳堃《中议公自订年谱》卷六，《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影印本，第141册，490-491页。

【1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一，《纪晓岚文集》第二册，233页。

【14】秦明《周易收藏汉魏碑刻拓本的来源》插图，《收藏家》2010年第10期，54页。

【15】彭蕴章《归朴丛稿》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18册，669页。

【16】《龚自珍全集》第四辑，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97页。

【17】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市图书馆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81页。

【18】参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军制志》，乌鲁木齐：新疆官书局，191年

【19】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第一编《建置》，同书编纂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42页。

【20】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第十八编《文化》，501页。

【21】三种《裴岑碑》拓片分见：藤原楚水《译注语石》，东京：省心书房，1975年，353页；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舍，1994年，79页；金石拓本研究会《汉碑集成》，京都：同朋舍，1994年，67页。

【22】[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kan0015x.html](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b/html/kan0015x.html)

【23】以上生平参李晋年《坤哈变事记》卷前魏长洪整理说明，载《近代史资料》总72号（1989年），兹据《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447页。

【24】王树楠等纂修《新疆图志》卷三九“学校”二，1923年东方学会印本，8B。

【25】《首都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首都图书馆编，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0册，80页。此跋文影印于《英吉沙尔厅乡土志》末页背面，应属后《镇西厅乡土志》。高健《论首都图书馆所藏新疆乡土志抄稿本之价值》已辨其装订或影印之误。文载《新疆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75-78页。

【26】参笔者《王树楠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075-1100页。

【27】矾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 东亚出版文化研究 总括班，2005年，下册，41页。

【28】参笔者《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8辑，待刊。